

「老革命」碰着「新問題」？ ——文革初期北京中學「反工作組」 事件考察（下）

• 楊 雋

編者按：本文第一至二節已於2026年2月號刊出；本期刊出第三至四節。

三 女附中：鄧小平的標竿

文化大革命爆發時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（以下簡稱「女附中」）最高負責人是1938年參加革命、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（亦在北京飯店參會），副校長胡志濤負責學校工作。卞仲耘和胡志濤（以下簡稱「卞胡」）自1949年起就服務於該校，是胡邀請卞入校工作^①。胡的政治生涯比較坎坷，曾因異議彭真的中小學政策被打成「右傾反黨份子」，下放工廠勞動四年，1962年才平反回校復任。卞說：「女附中的事，內有她，外有我，學校辦不好才怪呢！」^②

卞仲耘在校內頗孚人望，但因私事結怨於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員袁淑娥（出身資本家）。袁長期在京病休，1958年底卞住院期間與其相識。最初袁與卞家關係不錯，互相串門拜訪，卞還極力調解袁與丈夫丁德泗（貴州大學英文系肄業，韓戰時任志願軍英文翻譯）的矛盾。1963年袁通過卞將丁轉業到女附中當英語老師，但夫妻關係並未好轉，最終離婚。離婚後，袁向卞要求多扣發丁工資以補貼她，卞拒絕。1964年，丁因不願教女生被調往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^③。袁開始四處上訪狀告卞，意圖扳倒搞臭；更在1966年5月28日書寫針對其的萬字長信，寄毛澤東、團中央和北師大黨委，最終落到了鄧小平和胡克實處^④。

治校上，卞胡本來並不偏向高級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。如本文上篇所述，1962年小升初考試，劉平平離女附中分數線有兩分之差，卞胡請示上級

後未錄取；又如，批評某些高幹學生散播內部消息而被貼大字報，幫助出身不好的學生考入好大學，等等^⑤。卞認為「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文化的發達，光憑政治好而沒有真才實學根本辦不到」^⑥，但由於女附中的特殊地位，卞胡也不得不緊跟日益嚴苛的階級路線政策，乃至發生學生響應上篇提到的第四、第六、第八中學幹部子弟「鬧革命」事件。儘管校方及時平息，但階級路線卻愈演愈烈。

1965年上半年，女附中應西城區武裝部要求成立射擊隊，隊員成份「越越好，最好找將軍、元帥和有名的烈士子女」^⑦。在校禮堂召開的幹部子弟大會上，胡志濤說你們的父輩為新中國拋頭顱灑熱血，現在你們該為革命做更大貢獻^⑧。幹部子弟到十五歲遞交申請就可入團，可出身略有一點「污點」的都不行。初三(3)班葉維麗(父方實任新華社國內部總支書記)的三伯父葉篤義是「章(伯鈞)羅(隆基)聯盟」重要成員，五伯父葉篤莊因「美國特務問題」被關押，還有個出身剝削階級的「奶奶」，因此她是班中唯一未入團的幹部子弟^⑨。最明顯是在1965年招生時，高幹的孩子佔一半，鄧小平三女、時年十五歲的鄧榕，劉少奇與王光美的二女、時年十三歲的劉亭亭便在其中，更有相當數量高幹子弟被「照顧」進入該校。文革前夕，幹部子弟至少佔全校學生的35%，而高級知識份子和統戰對象只佔20%^⑩。高幹子弟成為學校的寵兒和驕子，這一現象當然並非女附中所獨有。

這些高幹子弟直接挑戰老師和學校的教育方針。1965年下半年高二(2)班幹部子弟要求改選班委會，她們認為班長出身不好應撤換，班主任執行了錯誤路線，最終校方撤換班主任^⑪。高二(4)班的李小琦(出身革命軍人家庭)當堂指責老師沒有自己的看法，課後是要罵便罵。年輕語文老師曾恬(父曾次亮是中華書局編審，夫童慶炳為北師大同窗)說：「我現在越來越管不了了，學生不怎麼尊重老師……學生對老師太不禮貌了！」胡志濤也說：「現在人與人平等關係都沒有了。」^⑫高幹子弟的驕橫之氣在文革來臨時到達頂點。

(一) 工作組進校：矛頭指向卞仲耘和教師

聶元梓大字報啟發了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。1966年6月2日晨6點，高三(4)班的劉進(高等教育部副部長、北大工作組副組長劉仰嶠次女)還未聽完播報中的聶元梓大字報，就找到高三(6)班的馬德秀(出身幹部)，隨後與其到校找到常為自己補習功課的宋彬彬(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三女)一同寫出大字報〈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？〉。年紀最大可能也入黨最早的劉進是執筆者，宋彬彬折服於她的「革命氣質」。她們遺憾未生在「革命年代」，惋惜學校「錯過四清」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們比一般幹部更早獲知北京市委主導下的中學四清已成「罪狀」，原希望學校能彌補這個「遺憾」。可學校執行的5月14日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指示^⑬，與這個期望背道而馳。其後宋碩倒台，「革命矛頭」就該對準校領導了。

6月2日上午，劉、宋、馬三人將這張攻擊學校教育路線、指責校領導阻止她們參加文革的大字報貼在宿舍樓鍋爐房牆上。「革命烈火」迅速點燃，